

我曾在欧美、东亚、中国等世界各地广泛进行关于“儒家伦理与文明对话”主题的探讨,但因为我把它看成一项发展中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建构的事业,所以并没有逼迫自己将它形成一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定稿。因为宏观叙事的目标并不是解决某个特殊问题,而是要分享一些观点。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某种“重叠的共识”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下面我主要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谈谈儒家伦理与其他文明的对话。

一、儒家伦理传统与印度文明之间的对话

1971年,作为第一个受邀的华裔学者,我第一次到印度进行学术交流。其时中印冲突已经过去十来年。但我发现印度学者对中国或中国文化有一种强烈的抗拒心理,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一种侵略倾向。因为印度从甘地以来和平观念极强。你第一次到印度之后会觉得他们很穷困,你会因为看到很多乞丐而感到不安。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印度是文化资源、精神资源非常丰富的文明古国。这次旅行对我震撼很大。除了哲学思想的丰富外(我们把印度叫做“哲学之乡”),印度更难得的地方是其他文化传统也相当丰厚,比如它的音乐、舞蹈、歌曲等。1994年我受印度哲学学会之邀,再次到印度交流,举行“国家讲座”。这次我去了“和平之乡”、佛祖讲经处等地。

这些经历使我觉得,中印对话的经验,是人类文明对话传统中我们最值得正视和宣扬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中印两大文明进行了和平、互惠的交流,期间没有任何武力和侵略的成分。印度将佛教的最核心的思想价值传给了中国。中国不仅欣赏、研究印度文化,而且亲自去印度取经,比如玄奘、法显等人。并且玄

奘取经回国之后受到政府极高的礼遇,显示出唐朝对玄奘所取之经的重视。佛教来到中国之后,通过格义、翻译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传统,比如华严、天台、禅宗等。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没有这样的现象的。但有趣的是,玄奘所带来的非常具有印度思辨特色的《唯识宗》在中国没有获得像华严、天台、禅宗、净土等那样的发展,它一直到清朝末期,因从日本传来有关法相宗的经典才重获重视和发展。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后来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主张——我们在文明对话时应该特别把印度作为我们的参照。这在今天接受的人已经多了,但在二十多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回应。之所以在文明对话时要重视印度,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1.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五十多年来,印度的民主是没有滑坡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1948年之后,印度没有出现很大的灾荒;即使出现很大的灾荒,也没有像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那样饿死数千万人。因为虽然印度很穷,资源不丰富,但它是民主的,官方和民间之间有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沟通,资源的分配、流通也相应顺畅,因此他们有能力面对大灾难。也因为如此,印度的知识分子处理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对自我进行了解时,其堂堂正正做人、不顺受任何其他压力的风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参照的地方。

2. 第二个就是印度与国际接轨方面的优势。印度十亿多的人口中,据说有两三亿是中产阶级,其中至少有数千万能纯熟运用英语。印度人在对数学的掌握、电脑的应用技能上也都很优秀。硅谷的领导者当中印度人居多,中国人居其次。印度很多大公司将美国的软件整批整批地吸收到印度去。比如,印度现在的班加罗尔(Bangalore),就被称为“世界的硅谷”,它的软件业发展很快。我们的中央领导到印度去后也多半强调和印度的科技交流。

3. 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甚至严格地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印度自己和其精神传统的关系。印度虽由英国殖民统治两百余年,但她的精神脊梁从来没有被打断过,也从未出现过一种强烈反传统的传统。印度对自己精神文明的爱护和正视已经成为共识。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说甘地。虽然他受的是英国教育,但却致力于印度文明的体现。当有人问及他对西方文明的想法时,他说“*It's a very good idea.*”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甘地认为,西方虽然科技发展很快,但还没有达到文明的高度,那只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比如哈贝马斯就认为,启蒙计划还没完成,他的一生的努力就是完成启蒙理念和启蒙计划。这反映出甘地根本不承认西方已有足为世人效法的先进文明。当然这很傲慢。尼赫鲁是印度领导当中比较西化的总理,但尼赫鲁曾说过,如果印度的精神文明和西方价值发生